

目 录

《李方桂全集》出版——语言学界的一件盛事……………李文山

“跨喜马拉雅语系”——兼论本谱系说对史前人群迁移之启发
……………无我(George van Driem)原著, 孙天心、田阡子节译

藏缅语动量词形成的动因和机制……………戴宗杰

复合元音在汉藏语中的语言类型……………田阡子

安多藏族说汉语普通话单音节的声调特点及其探源
……………刘岩、段海凤

仡佬语与壮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之比较……………许雁

从几个特殊语音看中国语言的丰富性……………丁思志

碧约哈尼语概况……………戴庆厦、经典

瑶族古文字考察报告……………李庆福、冯广艺、谢燮

汉语特征研究论纲……………李如龙

语言的起点思考与人本主义——以汉语为例……………史有为

上古阴声韵尾构拟再议……………邓葵、施向东

基于变换的“把”字句的分类研究和语言建模
……………王璐璐、袁毓林

“来着”的时体特征与语境的互动关系……………谢成名

说“璞”——汉语词考原之一
……………王敬骝、王育珊、王育弘

殷墟甲骨拼合四则……………李延彦

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拼合八例……………李爱辉

第十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综述……………彭茹

汉 藏 语 学 报

第8期

“跨喜马拉雅语系”

——兼论本谱系说对史前人群迁移之启发

无我 (George van Driem) 原著

孙天心 田阡子 节译*

[提要] “跨喜马拉雅语系”是世界使用人口第二多之大语系，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侧横跨喜马拉雅地区。本语系识别于1823年，名称有“藏缅语系”“汉-喜马拉雅语系”“印度-支那语系”“汉藏语系”“汉-奇兰蒂语系”等多种，反映不同之谱系关系模式，其中无实证支持者应予扬弃。本文介绍“跨喜马拉雅语系”之整体结构，尤其着重汉语之谱系地位。相较于其他谱系模式，“跨喜马拉雅语系”更能吻合历史语言学之新知卓识，更能提供其他学门民族语言史前史適切讯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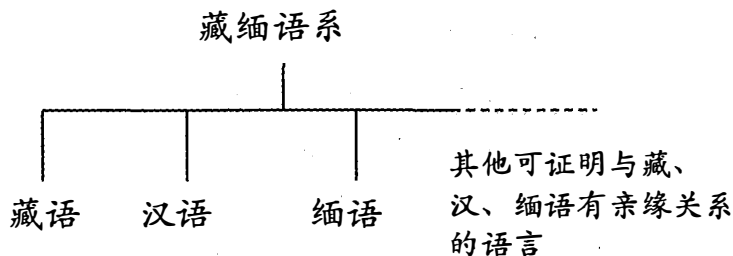
一 Julius von Klaproth 1823年提出之“藏缅语系”

Julius von Klaproth 1783年生于柏林，父亲是发明钽、铀与锆的 Martin Heinrich von Klaproth (1743—1817)。Klaproth通晓汉、满、维吾尔、梵、蒙古、土耳其、阿拉伯、波斯等语言，1802、1803年在魏玛 (Weimar) 发行《亚洲杂志 (Asiatisches Magazin)》，随后获聘圣彼得堡学院 (St. Petersburg Academy) 兼任研究员。1805年至1806年以大使团成员身份跟随Golovin公爵由陆路到中国；1806年至1807年为该学院在高加索地区从事语言学研究，1812年迁居柏林，1815年迁居巴黎，1816年获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三世资助，在巴黎授予教授头衔，1821年成为亚洲学会 (Société Asiatique) 创始成员。Klaproth依据荷兰殖民政府资料，确认台湾省南岛语属于南岛语系，并首创将现行之印欧语系依中性地理位置命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其想法是本语系地理位置最东南之僧伽罗语 (斯里兰卡境内) 属于印度语支，而

* 译者注：目前学术界对汉藏语系谱系存在极大争议，本文反映其中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特此译介，以飨读者。相关问题另可参考 Handel 2008; van Driem 2008; DeLancey 2011; Jacques 待刊。本文英文稿原刊于《现代人类学通讯》2011年第五卷 135—142页；中文译稿蒙《现代人类学通讯》编辑部授权另行发表，原作者拨冗审阅，特此致谢。

地理位置最西北之冰岛语属于日耳曼语支。

在1823年之巨著 *Asia Polyglotta* 中, Klaproth首次提出“亚洲地区语言系属多元”观点, 与当时盛行之“亚洲语言单源”说(如Leyden之“印度-支那语系”与Müller之“图兰语系”)大相径庭。Klaproth认为藏语、缅语和汉语属于同一语系, 而越南、泰、孟、高棉、尼科巴、日等语言则须划归不同语系, 其谱系分类之基础在于来自祖语传承(而非移借)之共同词根。Klaproth确立了“藏缅语系”(见图一)后, 此谱系名称开始流行, 相应之英语术语也广为大不列颠学者采用(Cust 1878, Forbes 1878, Houghton 1896)。



图一 Klaproth 依据亚洲语言多源说观点提议之藏缅语系

二 汉语官话为演化结果, 并非原始形式

1860年Carl Richard Lepsius (449—496) 根据汉语与藏语之间语音对应, 提议汉语声调来源为声母合并与韵尾脱落。他认为古代汉语许多音节形式现已消失, 汉语表意文字所代表之词形曾经包含词根音节以外之成分, 而现代汉语语音只能反映词根音节。这种观点与很多语言学者(如Chalmers 1866)表述多年的说法对立, 后者认为汉语语言类型数千年不变, 既无曲折变化也无黏附形式。Lepsius的学说后来启发了瑞典学者高本汉, 他首次依据历史比较法构拟了中古汉语。

三 古老的断层带: “藏缅语系”对“印度-支那语系”

在巴黎, Julius von Klaproth和Jean Jacques Huot 强调语言亲缘与生物谱系的分野, 但是部分学者仍无法接受。汉语和泰语语法类型的一致, 导致Heymann Steintal, Ernest Renan 和Arthur de Gobineau 等语言类型学家将其置于语言演化阶梯最低层, 只因为二者皆具有“单音节性”, 缺乏曲折变化。他们认为汉语和泰语具有亲缘关系, 与形态较复杂的“藏缅语”关系则不密切, 并且汉语和泰语所承载的是一种浅薄、进化

不足的思维模式。这种论辩方式遭到Wilhelm von Humboldt的追随者,例如August Friedrich Pott 和Max Müller 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语言结构和思维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此简单,而生物谱系与语言也不相干。

四 分崩离析的“印度-支那语系”说

依据John Leyden荒诞的“印度-支那语系”说,所有东亚地区、“印度与中国之间以及多数东方海岛居民的语言都显示相同的一种混合起源”。即使在当时1806年的时空背景下,这种浮夸之论也欠高明。因为当时 Frederick de Houtman (1603) 已识别出南岛语系, Klaproth后来(1822)又纳入了台湾省南岛语; Philli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 (1730) 勾勒出阿尔泰语系的轮廓, 随后Philipp Franz Balthazar von Siebold (1832) 加入了日语, George William Aston (1879) 再加入了韩语; Francis Mason (1854) 也识别出独立的南亚语系, 称之为“孟-高棉-蒙达”语系。此时“印度-支那语系”说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勉强苦撑“印度-支那语系”说的学者也只好逐步承认南岛、阿尔泰乃至南亚都是不同的语系。慕尼黑的Ernst Kuhn (1883, 1889) 于是把“印度-支那语系”范围缩小到仅包括“中国西藏自治区、缅甸、泰国、中国其他省份的语言”。因此, 在“汉风”熏陶下的种族语言类型论塑造了一种新版“印度-支那语系”, 将藏缅语与结构简单的汉语、卡岱语^①互相对立。这种“印度-支那语系”说之下分割出汉语的“藏缅语”与 Julius von Klaproth最初设立的“藏缅语”不是同一回事, 前者则将汉语与卡岱语扫入同一下层语支, 而后者包括汉语而排除了卡岱语。1856年, Wilhelm Schott对“印度-支那语系”提出警告, 他预见采用这个术语的人会继续以这个标签所代表的荒谬谱系模式进行思维。然而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81), Émile Forchhammer (1882), Ernst Kuhn (1883, 1889), August Conrady (1896), Berthold Laufer (1916), Kurt Wulff (1934) 等德国学者仍然沿用这个错误的模式, 将“印度-支那语系”划分为东部“泰汉语支”与西部“藏缅语支”。1924年, 法国东方学家Jean Przyluski 创立法文术语sino-tibétain, 内涵相当于当时英语之Indo-Chinese 与德语之Indo-Chinesisch, 指称的对象便是“印度-支那语系”。1931年 Przyluski 与 Gordon Hannington Luce 合写了一篇有关“汉藏语”数词词根“百”的论文, 刊登于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ino-tibétain之英译名称 Sino-Tibetan 因而进入英语。新的术语并未立即流行, 但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后, 总统富

① 译者注: 即壮侗语族, 包含壮傣、布央、黎、侗水、临高等语支。

兰克林·罗斯福设置“公共事业振兴署”以促进国内就业，柏克莱加州大学著名人类学家Alfred Kroeber 通过这个机构为他的“汉藏语文学项目”筹措到研究资金，项目名称沿用谱系标签Sino-Tibetan（“汉藏语”）。

Kroeber项目的实际执行者Robert Shafer发现“汉藏语系”说存在两点基本谬误，因此提议：（1）将卡岱语从“汉藏语系”移除；（2）将汉语与语系中其他语支置于同一层级。这两项建议如获采纳，其实便是回归Julius von Klaproth原先之“藏缅语系”模式。1938年，Shafer前往巴黎尝试说服法国汉学家Henri Maspéro接受他的想法。然而Maspéro坚持台语应放回汉藏语系。1945年Maspéro在美军解放Buchenwald集中营一个月前在营中过世。

随后，Paul Benedict（白保罗）加入柏克莱加大Kroeber的研究项目。他开始时曾沿用Indo-Chinese标签，其后即改用Kroeber的术语Sino-Tibetan。1942年时，白保罗已采纳Shafer关于卡岱语谱系地位的观点。讽刺的是，把卡岱语从“汉藏语”分离出去的功劳后来却归给了白保罗。20世纪60年代，马提索夫从白保罗那里继承了上述谱系理论。中国学者将这个风行美国的模式译为“汉藏语系”，且奉为圭臬。本模式赋予汉语支（Sinitic）特殊谱系地位，其种族语言观点竟完全植根于部分19世纪学者粗糙之语言类型论，误以为汉语和泰语在发展及结构上代表低级的演化阶段。

Nicholas Bodman（1976, 1980）引用历史语言学证据，对“汉藏语系”模式提出挑战，并提议新名称“汉-喜马拉雅语系”。Sergei Starostin（1994）同样质疑“汉藏语系”，提议改称为“汉-奇兰蒂”语系。

五 又一条古老的断层带：“历史语言学”对“语言类型学”

Trubetzkoy（1928）识别出“巴尔干语言区域”，其中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罗马尼亚、现代希腊（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语言共有一批结构特征，这些区域特征并非承继自祖语，也不见于本区域以外亲属关系密切的语言。Velten（1944）认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与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也是一个语言区域，其中Salish语系与无亲缘关系的Sahaptin语系具有共同类型特征。Haudricourt（1954）让我们也体认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苗瑶、侗台、南亚、藏缅等语系共有之声调发生倾向其实也属于区域特征。Emenau（1956）也依据不同语系跨越亲缘疆界之语音与类型结构共有特征，提出“印度次大陆语言区域”。虽有柏拉图本质主义的前提，并且缺乏语意严密性，《世界语言结构地图》仍可生动地阐明：人类语言语音特征与结构轮廓之地理分布并非为随机性的。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有意或者无意使用“汉藏语系”术语的学者仍沿用“藏缅语”这个术语，所指称者并非当初Klaproth之原意，而是承继“印度-支那”谱系论，将所有汉藏语系非汉语之部分视为仿佛真有密切亲缘关系之有效亚群。回顾历史，“印度-支那”（或“汉藏”）论从来就不是明智的谱系分类观点。“汉藏语系”这个标签代表的是个特定的谱系模式，认为本语系所有非汉语构成一个内部一致的亚群，虽然实证上找不到任何支持这种观点的语音定律或词汇创新。总而言之，二分式的“汉藏语系”并不存在。

六 语系内部谱系关系的建立

藏缅语系多数语言迄今未经描写，或仅有简略记录。凡是对本语系提出宏观谱系分类意见的学者，不能以此为借口不去广泛参考已有之语言描写记录，也不宜以否定式定义法将凡是缺乏汉语特征的语言都笼统纳入一个非汉语亚群。根据认识论原则，本语系的默认(default)谱系模式仍然应当是Julius von Klaproth在1823年提出的“藏缅语系”说。Klaproth 1823年在巴黎提出的未知论谱系模式在学理上中立不偏颇，在实证上最获支持，与当年在较明智之欧洲学术圈情况一样，日渐广为学界接受。而进一步提出具体谱系分类方案者自应担负举证之责，这包括全无历史语言学依据，囊括所有非汉语之幻想集合体“藏缅语”的“汉藏语系”理论，以及认为南岛语与“汉藏语”（提倡者沙加尔一直使用此名称）之间有谱系关系的“汉-南岛语系”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藏语和缅语之亲缘关系1823年即在巴黎提出，而在巴黎工作的沙加尔直到1994年才开始接受。对于“汉-南岛语系”假说，南岛语专家白乐思(Robert Blust)的评论是：“这是个顽念下的产物”(Blust 2009:707)；而多数历史语言学家也倾向不予采信或完全忽略。沙加尔对台湾省南岛语内部的谱系分类同样也不为Blust(2009)；Winter(2010)，Teng & Ross(2010)等南岛语学者接受。至今出版文献中，我本人对“汉-南岛语系”假说的观点(van Driem 2005)可算是最友善的评论。其实，若非仅属偶合，“汉-南岛语系”所谓的语音对应或许只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南岛语系与藏缅语系汉语支（或汉-藏语支(Sino-Bodic)）早期沿着东海岸龙山文化互动圈互相接触的残迹。

七 落叶模式的挑战

由定义可知，我在20世纪90年代倡议的“落叶模式”^①呈现的并非一种已确定的谱系关系。虽对高层语支划分采取未知态度，本模式并不否认谱系树确实存在，只是坚持谱系树的结构须借由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加以确定。当代以及未来的历史语言学家所面临的挑战，便是在新语支不断识别出来的情况下如何重建本语系内部的支属关系。这样的工作必须在可靠的语料与语音演变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而非在尚未见到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证据前，便轻率承袭自己导师或前人文献提供的错误谱系方案。

图二“落叶模式”示意图列举的藏缅语群可能尚未穷尽，其中Gongduk和Black Mountain Monpa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识别出来。目前学者持续提出新的分类假设，2001年首度提出的“落叶模式”也不断微调，轮廓日益清晰。新版示意图中纳入的新语群计有：孙天心2000年提出之嘉戎语群、Post和Blench 2011年提出之Siang语群、Yu 2011年提出之尔苏语群以及Jacques和Michaud 2011年提出之纳语群，Black Mountain Monpa、Lhokpu等不丹境内的语言也确立为独立语群。



图二 “落叶模式”呈现之“跨喜马拉雅语系”诸语支

^① 译者注：“落叶模式”是作者对藏缅语历史语言学现况的务实比喻：我们目前只能识别个别低层次语支或语群，就像在林中地上看得见的片片落叶，而语支高层次的支属关系则像落叶来源的枝干，以目前学术水平尚不能确切辨认。

“汉-藏语支”(Sino-Bodic)就是本语系一种旧有的高层支属假设。Klaproth (1823)早已观察到藏语、汉语间之系属关系似乎比二者与缅语之系属关系更为密切。Simon (1927, 1928, 1929)和Forrest (1956, 1962)更进一步列举汉语与藏语在汉藏语系中关系较接近的词汇证据。Robert Shafer (1955, 1966, 1967, 1968, 1974)也屡次指出,语言学证据显示汉语仅是汉-藏语系众多分支之一,并且汉语支与藏语支之间存在比与任何其他主要分支更亲密之亲缘关系。Bodman (1976, 1980)除列举汉、藏语支间密切亲缘关系之证据外,还建议将本语系改名为“汉-喜马拉雅语系”。我因而列举词汇证据,提出“汉-藏语支”(Sino-Bodic)假设(van Driem 1997)。Matisoff (2003)对此假设表达异议,然而大部分支持“汉-藏语支”之证据迄今依然成立(van Driem 2005)。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任何本语系各种非汉语之间存在任何共同创新之证据,能够支持“汉藏语系”假说中将汉语排除的所谓“藏缅语族”。2009年马提索夫公开表示,关于Klaproth最初的“藏缅语系”说,他的立场现已软化。^①同时,支持“汉-藏语支”的新证据也持续增加(Hill 2011, 郑张尚芳2011)。

2004年,我类推“亚-非语系”(Afro-Asiatic)名称,提出中性地理名称“跨喜马拉雅语系”(Trans-Himalayan Phylum)。创于1914年的“亚-非语系”名称现已取代旧称“闪-含语系”,同样因为“含语支”已证明并非正确谱系亚群。作为谱系名称,“跨喜马拉雅语系”明白揭示对内部亲缘关系采未知论观点,易于包纳新增内容,当属目前较优越的标签。相较之下,“汉藏语系”反映错误的谱系树模式,而“藏缅语系”在文献中则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为追随Julius von Klaproth多语支谱系框架者所用,一为遵循“汉藏语系”学说者所用。

八 分层次的民族语言史前史

在“跨喜马拉雅语系”观点下进行语言学研究之发现对依年代分层次的民族语言史前史观可以提供启迪。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和基因学为人类之过去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独立视野。即使以一个经对数调整之时间尺度来观察,历史语言学所能触及之时间纵深远比其他学科可探知之史前时间浅短。时间纵深差异如此巨大,反倒鼓励我们做出大胆预测:远在以语言学方法可拟测的过去时代,必定有人群向东、向北迁入东亚,其中或许包括现代藏缅语社群的祖先,随后在不同时间点一定发生过几波向不同方向进

^① 译者注:马提索夫教授在2012年新加坡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上也曾公开表示倾向接受汉语仅为汉藏语系下众多语支之一。

行之扩散:

1. 冰川时期过后向北迁徙的一拨儿人群, 发生时间之纵深已超过公认历史语言学可构拟之极限。

2. 部分古藏缅族群向东北迁徙至假设的“汉-藏语支”早期居住地。

3. 多个古藏缅群体在广大喜马拉雅地区逐步扩散, 当地迄今仍保留藏缅群体之前人类的语言与基因证据。

4. 考古、基因与语言学证据显示, “汉-藏语支”族群(包括汉语支族群)向南扩散, 与古苗-瑶族群、早期南亚族群、南岛族群及若干其他藏缅族群发生接触。

5. 藏语支族群穿越青藏高原扩散并且渗入喜马拉雅地区, 现今操藏、东藏(即门巴)、塔芒、西喜马拉雅等语言群体之分布可为佐证。

以上初步重建之史前族群扩散各阶段后, 又发生数次有史籍可征的民族语言迁徙:

6. 汉族迁徙, 过程中可能不断同化非藏缅群体以及其他藏缅群体(历史有记录且有确切语言与基因学证据)。

7. 操藏语之群体在青藏高原之扩散(历史有记录)。

参考文献

- Aston, William George. 187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XI(3): 317-364.
- Blust, Robert. 2009.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Bodman, Nicholas C. 1973. Some Chinese reflexes of Sino-Tibetan cluster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3): 383—396.
- Bodman Nicholas C.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In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ited by van Coetsem F, and Linda R. Waugh, 34—199. Leiden: Brill.
- Chalmers, John. 1866.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An Attempt to Trace the Connection of the Chinese with Western Nations in their Religion, Superstitions, Arts, Language and Traditions*. Hong Kong: De Souza & Co.
- Conrady, Alexander.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Ein Beitrag zu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 Insonderheit des Tibetischen, Barmanischen, Siamesischen und Chinesisch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 Cust, Robert Needham. 1878. *A Sketch of the Modern Languages of East India*. London: Trübner and Company.
- de Gobineau, Joseph Arthur. 1854, 1855.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4 volumes). Paris: Firmin-Didiot et Compagnie.
- de Houtman, Frederick. 1603. *Spraeck ende woord-boeck, Inde Maleysche ende Madagaskarsche Talen met vele*

- Arabische ende Turcsche Woorden: Inhoudende twaelf tsamensprekinghen inde Maleysche ende drie inde Madagaskarsche Spraken met alderhande woorden ende namen, ghestelt naer ordre vanden A.B.C. alles int Nederduytsch verduytsst.* Amsterdam: Jan Evertsz. Cloppenburch.
- DeLancey, Scott. 2011. On the origins of Sinitic. In *Proceedings of the 23r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3)*, Volume 1, edited by Zhuo Jing-Schmidt, University of Oregon, Eugene, 51—64.
- Emeneau, Murray Barnson. 1954. Linguistic prehistory of Indi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98(4): 282—292.
- Emeneau, Murray Barnson. 1956. India as a linguistic area. *Language* 32(1): 3—16.
- Forbes, Charles James Forbes Smith. 1878. O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10—227.
- Forchhammer, Émil. 1882. Indo-Chinese languages. *Indian Antiquary*, XI: 177—189.
- Forrest, R.A.D. 1956. Towards common Tibeto-Burman. *Wentti* 10: 1—18.
- Forrest, R.A.D. 1962.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Róng (Lepch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2 (3): 331—335.
- Handel, Zev. 2008. What is Sino-Tibetan? Snapshot of a field and a language family in flux.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Volume 2(3): 422—441.
- Haspelmath, Martin, Matthew Dryer, David Gil, and Bernard Comrie (eds.) 2005. *The World Atla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udricourt, André Georges.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e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 68—82.
- Hill, Nathan W. 2011. Multiple origins of Tibetan *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3): 707—721.
- Houghton, Bernard. 1896. 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palæontology.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6: 23—55.
- Jacques, Guillaume. The genetic position of Chinese. In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edited by Rint Sybesma, James Huang, Wolfgang Behr and Zev Handel. To appear.
- Jacques, Guillaume, and Alexis Michaud. 2011. Approaching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ree highly eroded Sino-Tibetan languages: Naxi, Na and Laze. *Diachronica* 28(4): 468—499.
- Kuhn, Ernst. 1883. *Über Herkunft und Sprache der Transgangetischen Völker*. München: Verlag der König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 Kuhn, Ernst. 1889. Beiträge zur Sprachenkunde Hinterindiens.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en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ünchen),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 Classe, II*: 189—236.
- Laufer, Berthold. 1916. The Si-hia language, a study in Indo-Chinese philology. *T'oung Pao* XVII: 1—126.
- Lepsius, Carl Richard. 1861. Über die Umschrift und Lautverhältnisse einiger hinterasiatischer Sprachen, namentlich der Chinesischen und der Tibetischen. *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aus dem Jahre 1860*, 449—496.
- Mason, Francis. 1854. The Talaing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IV: 277—289.
- Matisoff, James A. 2000. On 'Sino-Bodic' and other symptoms of neosubgroupit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3(3), 356—369.
- Post, Mark W. and Roger M. Blench. 2011. Siangic: A new language phylum in North East In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East Indian Linguistics Society, Tezpur University, 31

January to 2 February.

- Shafer, Robert. 1955. Classification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Word* 11: 94—111.
- Shafer, Robert. 1966.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Part 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Shafer, Robert. 1967.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Part I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Shafer, Robert. 1968.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Part III.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Shafer, Robert. 1974. *Introduction to Sino-Tibetan*, Part IV.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 Simon, Walter. 1927.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 XXX (1), 147—167.
- Simon, Walter. 1928. Zur Rekonstruktion der altchinesischen Endkonsonanten, II. Teil.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Berlin* XXXI (1), 157—204.
- Simon, Walter. 1929.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ein Versuch.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Friedrich-Wilhelms Universität zu Berlin* XXXII (1): 157—228.
- Starostin, Sergei Anatolyevich. 1994.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Kiranti.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7th Congrès International sur les Langues et la Linguistique Sino Tibétaines, Centre International d'Études Pédagogiques à Sèvres, 14 octobre.
- Sun, Jackson T.-S. 2000a.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Gyalrong and Lavrung in 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161—190.
- Sun, Jackson T.-S. 2000b.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lidating the 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11—232.
- Teng, Stacy F. and Malcolm Ross. 2010. Is Puyuma a primary branch of Austronesian? A reply to Sagart. *Oceanic Linguistics* 49(2): 543—558.
- Trubetzkoy, Nikolai Sergeyeovich. 1928. *Établissement et délimitation des termes techniques*. Leiden: A.W. Sijthoff's Uitgeversmaatschappij.
- van Driem, George. 1997. Sino-Bodic.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0(3): 455—488.
- van Driem, George. 2005. Sino-Austronesian vs. Sino-Caucasian, Sino-Bodic vs. Sino-Tibetan, and Tibeto-Burman as default theory. In *Contemporary Issues in Nepalese Linguistics*, edited by Yogendra P. Yadava et. al., 285—338. Kathmandu: Linguistic Society of Nepal.
- van Driem, George. 2008. To which language family does Chinese belong, or what's in a name. In *Past Human Migrations in East Asia: Matching Archaeology, Linguistics and Genetics*, edited by A. Sanchez-Mazas et. al., 219—53.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Velten, H. V. 1944. The Nez Perce verb. *The Pacific Northwest Quarterly* 34(3): 271—292.
- von der Gabelentz, Hans Georg Conon. 1881.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T.O. Weigel.
- von Klaproth, Julius Heinrich. 1822. Sur la langue des indigènes de l'Île de Formose. *Journal Asiatique* 193—202.
- von Klaproth, Julius. 1823. *Asia Polyglotta*. Paris: A. Schubart.
- von Siebold, Philipp Franz Balthazar. 1832. Verhandeling over de afkomst der Japanners. *Verhandelingen van het Bataviaasch Genootschap van Kunsten en Wetenschappen* 13:183—275.
- von Strahlenberg, Philip Johan. 1730. *Das Nord- und Östliche Theil von Europea und Asia, in so weit das gantze Russische Reich mit Siberien und grossen Tatarey in sich begreiffet, in einer Historisch-Geographischen Beschreibung der alten und neueren Zeiten, und vielen andern unbekanntten Nachrichten vorgestellt, nebst*

- einer noch niemahls and Licht gegebenen Tabula Polyglotta vonzwei und dreyßiglei Arten Tatarischer Völcker Sprachen und einem Kalmuckischen Vocabulario.* Stockholm: In Verlegung des Autoris.
- Winter, Bodo. 2010. A note on the higher phylogeny of Austronesian. *Oceanic Linguistics* 49(1): 282—287.
- Wulff, Kurt. 1934. *Chinesisch und Tai: Sprach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Det 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 Historisk-filologiske Meddelelser, XX, 3). Copenhagen: Levin & Munksgaard.
- Yu, Dominic. 2011. Reconstructing Proto-Ersuic.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th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Kō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6 September.

The Trans-Himalayan Phylum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Prehistory

George van Driem

Abstract: The world's second most populous language family straddles the Himalayas alo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flanks. The Trans-Himalayan language phylum has been known by various names since it was first recognized in 1823, such as Tibeto-Burman, Sino-Himalayan, Indo-Chinese, Sino-Tibetan and Sino-Kiranti. Each label presumes a different model of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 It is high time that empirically unsupported models be discarded.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family as a whole is present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itic. The Trans-Himalayan model is amenable to accommodating new historical linguistic insights and can better inform other disciplines about ethnolinguistic prehistory than the competing language family models.

(通信地址: 无 我 (George van Driem) CH-3000 Bern 9, Länggassstrasse 49, Institut für Sprachwissenschaft, Universität Bern
孙天心 115 台北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
田阡子 650500 昆明 呈贡新区聚贤街 768 号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